

# 丝路之光

## 垦利海北遗址考古与文物精粹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  
垦利区博物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丝路之光

垦利海北遗址考古与文物精粹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  
垦利区博物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之光: 垦利海北遗址考古与文物精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垦利区博物馆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325-8492-5

I. ①丝… II. ①山… ②山… ③垦… III. ①文化遗产—考古—垦利县 IV. ①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3060号

### 丝路之光: 垦利海北遗址考古与文物精粹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  
垦利区博物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mailto: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72,000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7-5325-8492-5

K·2337 定价: 19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书得到山东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项目“海岱地区秦汉时期陶瓷器与社会”、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山东地区古代瓷器手工业综合研究”资助。

# 北海北遗址

张雨晨

策 划

李 青

主 编

陈章龙 赵清华

编委会

柴丽平 孙小光 盖丽梅

宋 杨 张艳丽 苟小霞

# 序

百余年前，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及“丝绸之路”(Silk Road)一词。在他的概念里，所谓“丝绸之路”仅指汉代欧亚的贸易通道，甚至仅指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欧亚交通道路。此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他根据新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如今，随着世界多元文化体的加强和国际贸易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几乎已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sup>[1]</sup>。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尼期间，又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千百年来，东、西方不同的种族、文化相互碰撞、交相辉映形成的经济、文化走廊，如今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外交政策中重要的既定方针，丝绸之路作为多元文明碰撞与交流的遗产并非中国独享，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丝绸之路内涵的升华，与“陆上丝绸之路”关系密切，都是联结古代中国和中亚、波斯以及欧洲、非洲和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文化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属于世界贸易文物，其文化特点是既有输出也有输入，体现了世界多元化的融合。

近年来，围绕着“海上丝绸之路”，国内外相关组织、科研机构开展了一系列考古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对其内涵的认识及相关研究建树颇丰。1987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历史博物馆设立我国第一处水下考古专业机构——水下考古学研究室。1987年至1990年间，通过派人出国学习和与外国水下考古研究机构合作的方式，培训了新中国第一批水下考古专业人员。此后的几十年间，我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

[1] 现今，通行泛指的“丝绸之路”包括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以及跨黄、渤海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船遗址<sup>[1]</sup>、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 I 号宋代沉船遗址<sup>[2]</sup>、平潭碗礁 I 号清代沉船遗址<sup>[3]</sup>、西沙华光礁 I 号宋代沉船遗址<sup>[4]</sup>、广东阳江南海 I 号宋代沉船遗址<sup>[5]</sup>、南澳 I 号明代沉船遗址<sup>[6]</sup>等进行过调查、发掘工作。此外,一部分内陆河湖淤积型遗址,如宁波义和路遗址<sup>[7]</sup>、安徽淮北柳孜运河<sup>[8]</sup>、河北黄骅海丰镇遗址<sup>[9]</sup>等考古发掘,均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社会影响巨大。国外,埃及福斯塔特、印尼黑石号沉船、朝鲜新安沉船等古代遗存,均出土大批中国陶瓷器及相关遗物,进一步丰富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广度、维度。伴随着一系列考古工作的开展,正是对其背后所反映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

历史上,山东半岛地区作为中原王朝往来于东北亚地区诸政权的重要阵地,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隋唐始,中原王朝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交往日趋频繁,层次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山东半岛的诸多港口既是新罗、日本进出中国大陆的主要通商口岸,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sup>[10]</sup>。五代之际,中国北方虽朝代更迭、战乱频繁,但山东半岛作为高丽、渤海等国与中原王朝的唯一通道,对外贸易仍是非常繁荣的。北宋时期,“(山东)登州三面距海,祖宗时,海中诸国朝贡,皆由登莱”<sup>[11]</sup>。“(登州)西至大海四里,当中国往新罗、渤海大路”。“黄县界(今龙口市)更经乌趣、石埠二山之间,又东经县理,东达于海,海东诸国朝贡必由此道”<sup>[12]</sup>。此外,密州板桥镇,“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sup>[13]</sup>。说明此时山东半岛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连接东南沿海闽广、江淮、江浙以及中原地区的枢纽,各地商贾云集的区域中心,更是北宋时期对外的贸易重镇。因此,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境遇,使山东地区对内、对外经济往来具备优良的条件。

如今,围绕着“海上丝绸之路”,山东地区也陆续开展相关考古工作。1984年,蓬莱水城小海进行大规模清淤过程中,出土大量文物,包括古船、武器、货币和大量陶瓷器。此后,200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组成的考古队,配合蓬莱水城小海清淤工作,又发掘三艘元、明时期的古船,获得重要成果。这些说明登州港在宋元时期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并在南瓷北运中起到重要作用,对于研究蓬莱水城与登州古港的历史变迁、古代造船技术与海防建设以及“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面貌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

[1] 张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科学出版社,2001年。

[2] 赵嘉斌、吴春明:《福建连江定海湾沉船考古》,科学出版社,2011年。

[3] 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科学出版社,2006年。

[4]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学出版社,2006年。

[5] 魏峻:《南海 I 号沉船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国文化遗产》2008年第1期。

[6] 孙键:《海上丝路余晖——“南澳 I 号”明代沉船发掘》,《2010年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7] 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宁波和义路遗址发掘报告》,《东方博物》第一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8]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9] 黄骅市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10] 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第五章“隋唐时期——登、莱是‘极海之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11]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一十七《舆地考·登州》,《四库全书》影印本。

[12]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十《河南道·登州》,《四库全书》影印本。

[13] (元)脱脱《宋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第4560、4561页。

价值<sup>[1]</sup>。1996年至2009年期间,胶州市政府在基建过程中发现部分与历史上板桥镇相关的遗存,后为加强对板桥镇的科学研究,探寻古板桥镇历史,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胶州市博物馆,对胶州市老城区开展了课题性的考古工作。这些考古工作不仅对于胶州和青岛的历史沿革及城市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青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之一的重要证据<sup>[2]</sup>。海北遗址的发现、发掘,获得大量与陶瓷器贸易、港口海运有关的遗存,也说明海北遗址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联系。

优越的史地位置以及丰富的考古材料,赋予海北遗址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重要地位。地理位置上,海北地区地处渤海湾腹地,黄河入海口。该区域虽自隋唐时期才脱海成陆,但宋金之际已明确有人居住、开垦(属河北东路滨州渤海郡)。历史上,特别是隋唐之际,山东半岛的诸多港口既是新罗、日本进出中国大陆的主要通商口岸,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sup>[3]</sup>。这一时期,登州是出入高丽、渤海国的主要口岸,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北宋时期,由于战争和统治政策的原因,登州港渐次封闭,密州板桥镇代替登州成为宋政府北方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海北遗址,正处于登、莱二州辐射范围内,必会受到当地社会政治环境影响,相应的发展轨迹也会呈现阶段性特征。这一点也正好从考古材料得以证明:海北遗址历次考古工作所获得材料,时代特征主要集中于宋、金之际,产品面貌较为统一,说明该遗址繁荣阶段正处于宋、金时期。其次,海北遗址隔莱州湾与登州古港遥相呼应,类似的遗址,往北可见河北黄骅海丰镇遗址,往南则是胶州板桥镇遗址等,其考古出土材料较为接近,遗址内涵也存在一定相似之处。考虑到环渤海地区与东北亚古代诸国的政治、经济交流,共同的历史境遇,可以肯定,这部分遗址均与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联系。

海北遗址的发现,虽然仅是为数不多的几处遗址之一,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多种科技手段的运用,会有更多类似的遗址被发现。通过新发现的一处处遗址点的积累,会逐渐形成一条逐海岸的线,从而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材料和视角。海北遗址,也将成为众多角色中的重要环节。

方辉

2017.10

[1] 席龙飞等:《蓬莱古船与登州古港》,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89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蓬莱古船》,文物出版社,2006年。

[2]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胶州板桥镇遗址考古文物图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

[3] 刘凤鸣:《山东半岛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第五章“隋唐时期——登、莱是‘极海之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



# 目 录

序 / 001

一、海北遗址史地概况及历次考古工作概况 / 001

（一）海北遗址史地概况 / 002

（二）海北遗址历次考古工作概况 / 008

二、定窑系白瓷 / 021

三、景德镇青白瓷 / 039

四、临汝窑青瓷 / 049

五、山东本地窑口瓷器 / 067

六、其他窑口瓷器 / 113

七、建筑构件 / 117

八、钱币 / 125

九、其他遗物 / 135

结 语 / 149



一、海北遗址史地概况及  
历次考古工作概况

## （一）海北遗址史地概况

海北遗址，位于今东营市垦利区胜坨镇海北村北，东经 $118^{\circ}28'$ ，北纬 $37^{\circ}32'$ 。遗址东西长390米，南北宽225米，面积约87 000平方米（图一）。垦利区（原为垦利县，2016年8月2日正式撤销垦利县，设立东营市垦利区），因称“垦区”和“利津洼”而得名，1943年建立垦利县抗日民主政府，首次称名为“垦利”<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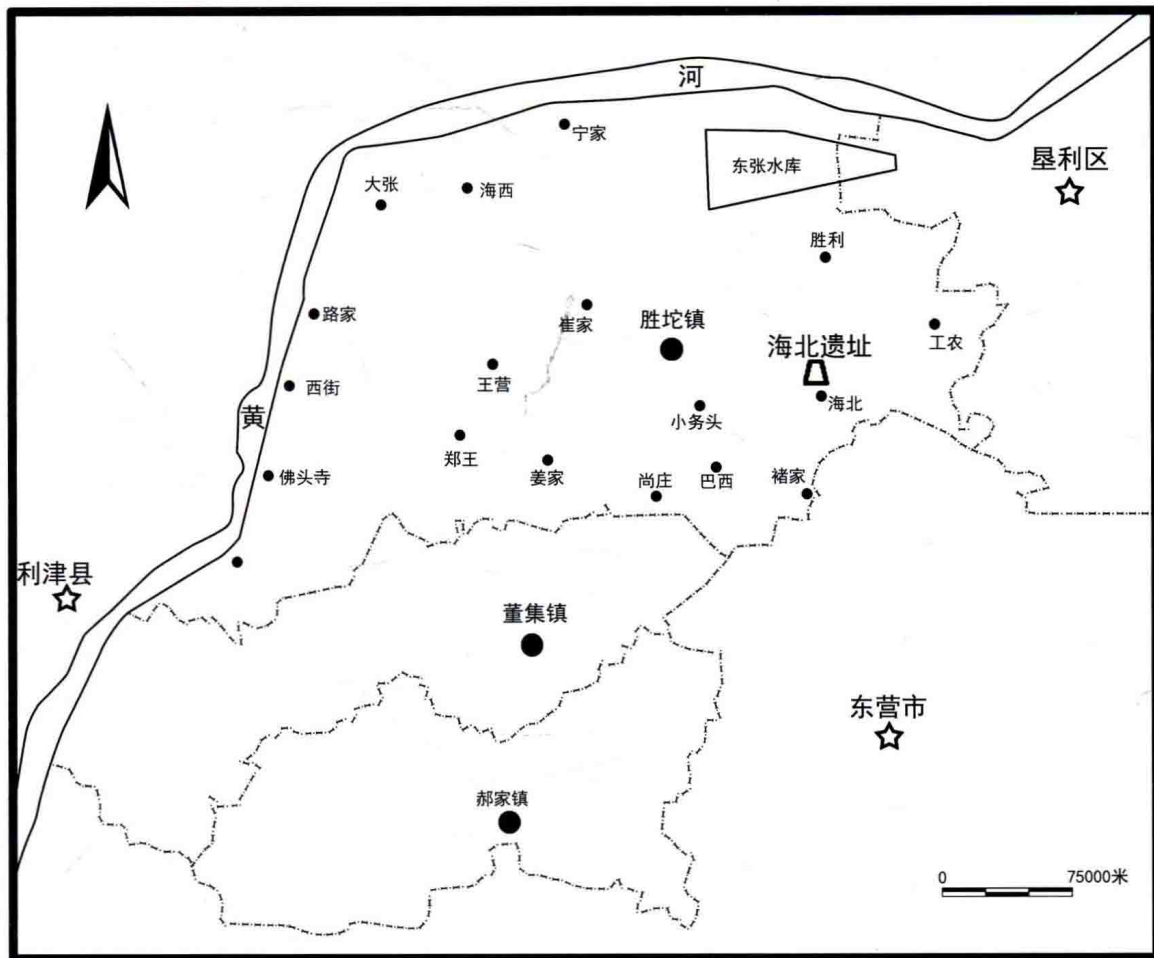
地理位置上，海北遗址位于垦利西南部，地处山东省东北部黄河入海口，黄河三角洲冲击平原地带（图二）。东濒渤海，西、北倚黄河，与利津县隔河相望，南面毗邻东营市东营区。

长期以来，黄河尾间段常常左右摆动，多次溃决、漫溢、泛滥而冲积、淤垫，形成以河床为基础的指状起伏地形，造就该地区西北高、东南低、呈扇形微倾斜的地势。境内新老河道纵横交错，互相切割、重迭，呈现岗、坡、洼相间的复杂地貌。明末顾柔谦（顾一柔）在其所著《山居赘论》里就曾说道：“大河之流，自汉至今，迁移变异，不可胜纪。然孟津以西，则禹迹具存，以海为壑，则千古不易也。自孟津而东，由北道以趋于海，则澶、滑其必出之途。由南道以趋于海，则曹、单其必经之地……要以北不出漳、卫，南不出长淮，中间数百千里，皆其纵横糜烂之



图一 海北遗址地貌全景图

[1] 垦利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垦利县志》，中华书局，2004年。



图二 海北遗址位置示意图

区矣。”<sup>[1]</sup>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省兰阳县铜瓦厢(今河南兰考境内)决口,于山东寿张县张秋镇(今山东阳谷境内)穿过运河,夺大清河河道,由利津铁门关(今汀罗镇前关村)以下牡蛎口入海,从而结束了黄河700余年夺泗入淮的历史,重新由渤海湾入海<sup>[2]</sup>。光绪九年《利津县志》记载:“牡蛎嘴即河入海处,闻诸土人,此地出牡蛎,自黄河入境,河淤增长,牡蛎痕迹具湮,而海门以上,萧圣庙以下数十里,葭苇繁茂,名曰苇荡,小民资以为利。往者海艘停泊,直抵萧圣庙,今则不能进口,悉泊太平湾矣。”<sup>[3]</sup>这也说明,黄河的改道不仅改变了局部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而且对物质文化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黄河的变迁与当地历史人文环境息息相关。

西汉时期,该地域尚处于渤海之中。当时,今利津县南境均为滨海滩涂,海岸线大致位于今利津县北望参门、利津城、宫家一线。《东营市志》记载:“西汉之前,黄河三角洲地域均在海水之中。海岸大致在今大山、明集、利津城、史口、辛店、支脉沟口一线。利津城东南至史口之间有一自然海湾,南北宽约10公里,东西长40公里,延伸至小营一带。”<sup>[4]</sup>

[1] (明)顾柔谦:《山居赘论》,载《禹贡锥指》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24页。

[2] 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3页。

[3] (清)盛赞熙:《利津县志》第二卷《舆地图》,《中国地方志集成》第二十四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年,第298、299页。

[4] 东营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东营市志》,齐鲁书社,2000年。



图三 魏晋时期垦利地区地势及甲下邑位置图  
(引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今河南濮阳)决口改道东流,至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由青州部千乘郡(今利津县东南境)入海,此后经过长期的淤积造陆,逐渐孕育出这片年轻的土地<sup>[1]</sup>。《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今董集镇西南部地区春秋时期已是陆地,至三国、魏晋时期还出现重镇“甲下邑”(图三)。

《沧海桑田黄河口》指出:“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修千里长堤束水,经现滨州市在利津城南入海。至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河口经200多年的淤积延伸,原蓼城东南伸入西南的大海湾已淤成陆地,出现河口重镇名‘甲下邑’(今龙居镇东北)。魏(三国)元帝景元二年(公元261年),黄河仍在利津城以东甲下邑以北入海。隋文帝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黄河经滨州,绕利津城折向北,在现盐窝镇入海,此时的海岸线已推移至今富国(沾化县)、盐窝、坨庄、沙营以北一线。”<sup>[2]</sup>《山东通志》记载:“阴县故城北,又东北漯沃津,又东迳千乘城北,又东北迳利县城北(今博兴店子镇利城村),又东分为二水,枝津东迳甲下城南,东南历马常坑注济,又东北过甲下邑,又东北入于海。”<sup>[3]</sup>《历代黄河变迁图考》也指出:“(黄河)又东北过利县北,又东北过甲下邑。济水从西来注之,又东北入于海。酈注:河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津东迳甲下城南,东南历马常坑注济。经言济水注河,非也。河水自枝津东北流迳甲下邑北,世谓之仓子城,又东北流入于海。以今舆地言之,滑县、开州、观城、濮州、范县、朝城、阳谷、茌平、禹城、平原、陵县、德平、乐陵、商河、武定、青城、蒲台、高苑、博兴、利津诸州县界中,皆东汉以后大河之所行也。”<sup>[4]</sup>可以看出,三国、魏晋时期原

[1]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八节“两汉的黄河”,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70页。

[2] 蒋义奎、崔光:《沧海桑田黄河口》,黄河水利出版社,2009年。

[3] (清·光绪)《山东通志·河防志第九·黄河考上》,第3393页。

[4] (清)刘鹗:《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第六》,光绪癸巳仲冬袖海山房石印本,第52、53页。



黄河入海处流向较为平稳,黄河三角洲地区重镇“甲下邑”所在地是黄河在该阶段最稳定的入海口。甲下邑,世谓之“仓子城”,即《水经》甲下邑之城也,当在今利津县东南<sup>[1]</sup>。《乐安县志》中曾经提到“惟甲下邑不知所在”。后刘建春《追溯甲下邑长河口刘家》考证“甲下邑、长河口、刘家村实为一地”,即现董集镇刘家村一代。综合考量,说明这一时期黄河入海口正位于该地区。

隋唐之际,山东半岛的登州(今蓬莱)、莱州(今掖县)一直都是中、韩、日官方及民间往来、贸易的主要港口,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sup>[2]</sup>。《元和郡县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新唐书》等均证实山东半岛在当时三方交往中的重要地位。毗邻登、莱二州,同样环伺于莱州湾的利津地区,这一时期隶属渤海郡、棣州,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隋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废渤海郡置棣州,十六年(公元596年)废漯沃县置蒲台县,辖永利镇。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改棣州为沧州,三年(公元607年)废沧州复置渤海郡,辖蒲台县。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分蒲台、厌次置勃海县(今北宋乡褚官村附近)。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棣州属河北道。五代复置,唯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置滨州。《元和郡县志》“蒲台县”条记载:“海在县东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高一丈、周回二里,俗人呼为斗口淀,是济水入海之处,海潮与济相触故名……黄河西南去县七十三里。”“厌次县”条载:“黄河在县南三里,滴河在县南四十里,通海故关在县西南四十里。”<sup>[3]</sup>“景福后,(黄河)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东南,而东注于海。注:勃海县西至棣州七十里,其故城在今滨州东”<sup>[4]</sup>。《太平寰宇记》“滨州”条载:“滨州,今理渤海县,本瞻国军,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三月升为州,仍割棣州之渤海、蒲台两县属焉……渤海县……本汉蒲台县地。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分置渤海县,以在渤海之滨为名。天宝五年(公元746年)以地土碱卤,自旧县西移四十里,就李丘村置即今理。大海在县东一百六十里,旧黄河在县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公元893年)后,河水道移,今枯。蒲台县……本汉湿沃县,属千乘国……古蒲台在县北四十里……东去海二十五里……黄河西南去县七十里,大海在县东一百四十里。”<sup>[5]</sup>《历代黄河变迁图考》载:“以今舆地言之,溶县清丰观城、聊城、平原、陵县、商河、齐东、武定、蒲台、利津,南接滑县、开州、濮州、范县、阳谷、茌平、平阴、长清、临邑、济阳,后徙经滨州、海丰,不入蒲台、利津诸州县界中,皆唐历五代以迄宋初黄河之所行也。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辛未,河徙由千乘入海后五十九岁,为后汉明帝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庚午王景治河功成,下逮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甲戌,有横陇之决,又十四岁为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戊子复决于商胡,而汉唐之河遂废,凡九百七十七岁。”<sup>[6]</sup>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黄河,自东汉王景系统疏导,至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由今惠民县境内改道北流以来,流向一直较为平稳。虽然该地区行政区划几经变动,但黄河改道产生的地理单元格局基本形成,而且已经存

[1] 杨守敬:《水经注疏》卷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08、509、7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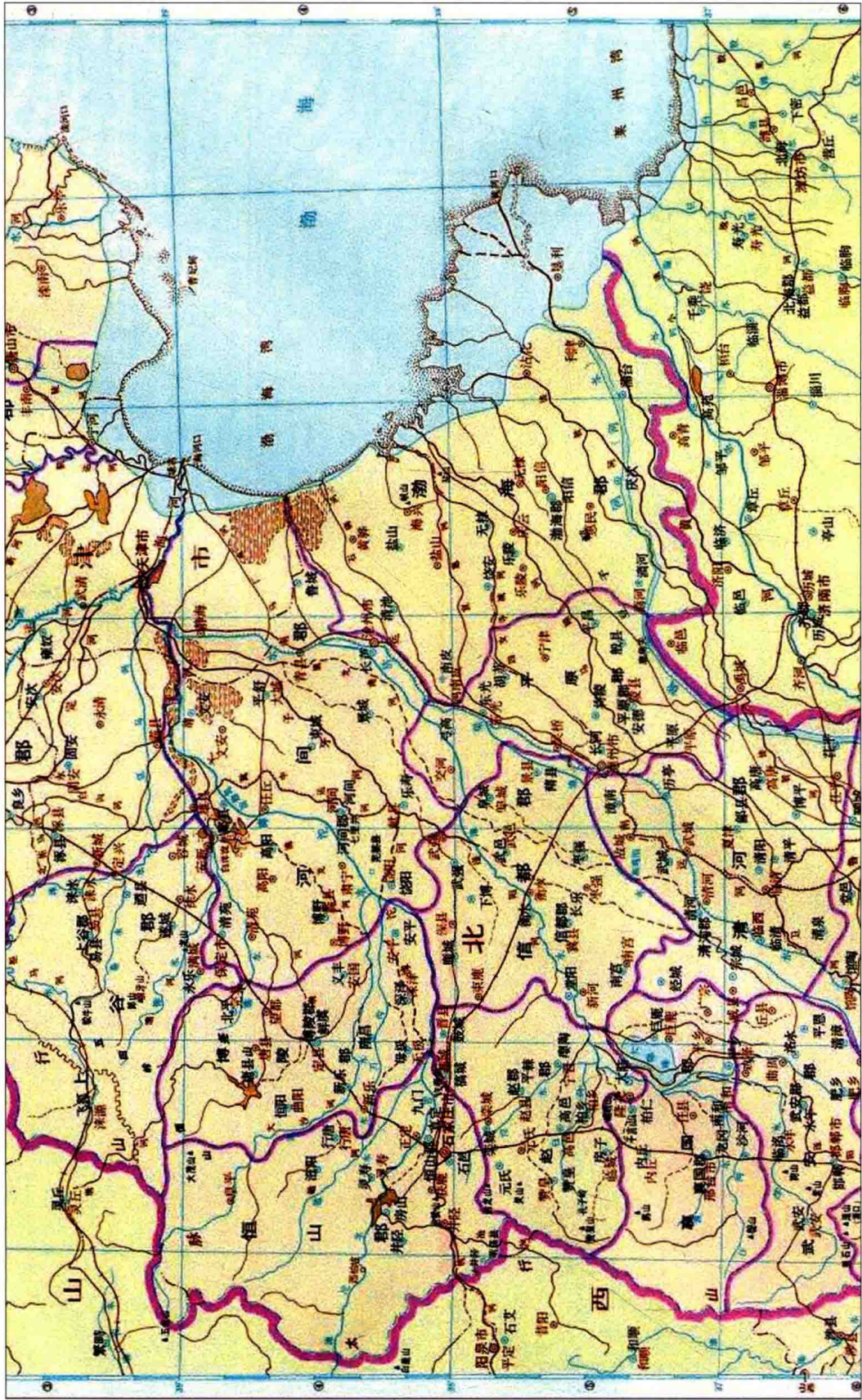
[2] (唐)贾耽:《新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

[3]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河北道二》,《四库全书》影印本,第388、389页。

[4] (清)胡渭:《禹贡锥指》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01页。

[5]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河北道十三》,《四库全书》影印本,第531、532页。

[6] (清)刘鹗:《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第七》,第57、58页。



图四 隋河北诸郡(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引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图五 宋元时期海北遗址所处位置图(引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在专门的海路关口(口岸)。蒲台、渤海乃至此后的滨州,据文献载其东距海岸均在一百四十里左右。蒲台,始设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其前身为汉武帝时期的湿沃县。《蒲台县志》载:“邑境汉武帝间置湿沃县;新莽时改延亭县,后复名;随改蒲台县。”1956年3月建制撤销,黄河以北属地划并于滨县(今滨州市),黄河以南属地分别划并于博兴县和齐东县。隋唐时期,今利津县西南部已成陆,设永利镇,属渤海郡蒲台县。今垦利境内西南部的胜利、郝家、董集、胜坨、宁海等地也已脱海成陆(图四)。

宋金时期,垦利境内已有人居住开垦,逐渐形成村落,时为河北东路滨州渤海郡勃海县属地(图五)。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被金兵占领,后归金国版图。金明昌三年(公元1192年)十二月,政府升永和镇置利津县,并在邻近沿海一带建立丰国镇、永阜镇、宁海镇,置巡司统管。当时县城东北至海30公里,今汀河乡正处于海岸线上。此后,济水入原黄河流路经本境入海,时称北清河。海北遗址处于北清河与渤海的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自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始,“疏汴水北入五丈河,东流经定陶北入于济,齐、鲁舟楫皆达大梁”<sup>[1]</sup>。由此开通了由东京开封连接今山东地区的水上通道。此条通道由开封东北经东明、定陶、济州合蔡镇(巨野西北),入梁山泊达于浑州(今巨野西北),后沿北清河出海,“以通青、郅之漕”,是京东地区的主要水道<sup>[2]</sup>。随着京东运河的复航,山东地区逐渐成为北宋政府赖以生存的地方经济支柱,山东半岛在南北方经济交流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1]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2117页。

[2] 陈杰:《从南方瓷器出土看宋元时期山东的水路交通》,《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 （二）海北遗址历次考古工作概况

海北遗址——目前垦利境内发现的一处较早的古遗址，丰富了垦利地区的人居历史。同时，该遗址出土窑口众多、时代特征鲜明、数量庞大的瓷器标本，证实宋金时期垦利地区与外界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并为山东地区古代遗址出土的宋金瓷器的断代提供了可靠依据。该遗址自发现之初就引起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相关部门也多次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钻探、发掘工作，为该遗址的进一步保护、研究提供相应的技术、材料支撑。

2006年4月，垦利县文化馆接到胜坨镇海北村村民报告后，立即组织东营市文管所、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有关人员赴现场进行实地考古调查，初步确定该遗址为宋元时期。此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佟佩华副所长和李振光主任前来进行考古调查，认为该遗址出土的瓷器标本，标准高、档次高、窑系多实属罕见，特别是在东营沿海地区属首次发现（图六）。它的发现将对研究东营地区及垦利县的历史发展和文化渊源提供非常重要的实物依据。

2006年6月3日，鉴于该遗址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垦利县文管所特聘请北京大学权奎山教授对遗址出土标本进行鉴定，并深入遗址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权教授认为遗址出土的瓷器标



图六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专家查看海北遗址出土文物



本品种多、内容丰富,其时代为北宋、金、元时期,以北宋、金代数量为多,有不少标本为当时名窑烧造,如河北定窑、河南青瓷窑、江西景德镇、河北磁州窑等。

2006年11月1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以及垦利县文体局、文化馆结合遗址的分布情况及地质特点,确定南、北两个发掘区:南区探方在遗址的重点区域,呈东西走向,面积为200平方米;北区探方在南区北侧约50米处,走向及面积同南区。

正式发掘之前,考虑到该地区地质结构复杂,地下水充沛,南、北两区先于11月2日在发掘区周围实施降水。采用渗水沟渠、“十字形”插管的方式昼夜抢排(图七)。直至南区探方地下水位降至2.1米,北区探方地下水位降至0.6米后进行考古发掘,到11月23日降水停止。

11月10日,东营市历史博物馆5名考古技术人员和垦利县文化馆5名专业人员及14名民工进驻工地,进行正式发掘。其中,南区共布5米×5米探方4个(T1、T2、T3、T4),严格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进行。到11月17日发掘至距地表2.1米处,开始出现大量积水,发掘工作暂停,实际发掘面积64平方米。在此情况下,为进一步了解地下文化层堆积情况,在南区主探方内进行考古钻探,确定该区域往下约2.5米左右包含物较丰富,但因积水严重无法继续发掘。

此后,发掘组工作人员多次召开会议,因地制宜,调整发掘方案,辅助以泥浆泵进行下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发掘区域仍为南区,29日上午正式开始,到12月14日发掘结束,历时16天,实际清理面积1230余平方米,搬运土方5300余立方米,发掘平均深度4.8米左右。至此,南区探方考古发掘完成。北区由于季节、地理等原因,未进行下一步发掘。

此次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种类繁多,数量庞大,部分质量较好。种类有瓷器、陶器、古钱币、砖、瓦、瓦当、动物骨骼、贝类等,包括生活用器、装饰用品、建筑构件等。



图七 海北遗址发掘区降水设施